

# 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的教诲机制研究

赵一凡 徐德荣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针对优秀创作童话中备受争议的哥特元素何以存在、有何意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诲功能,而其教诲功能的实现便是哥特元素在儿童心底播撒光明的原因。就哥特元素教诲功能的实现机制,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以安徒生、王尔德童话为例,探索了实现教诲的情感机制与叙事机制,认为基于哥特式情感线索的情感反应作为情感机制、哥特式“非黑即白”的叙事呈现作为叙事机制,帮助儿童在“诡异”的哥特式语境、“惊奇”的哥特式心境中,通过与人物共情与移情,熟悉、模拟善恶选择,不仅完成“人”的身份确认,也逐渐养成理性情感,形成健康的社会伦理与自我伦理,实现伦理平衡。

**关键词:**创作童话;哥特;文学伦理学批评;道德教诲;教诲机制

**中图分类号:**I28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6-0078-12

## 0 引言

儿童文学中的黑暗元素向来广受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暴力、死亡等黑暗元素相关的描写在儿童文学中广泛存在;其中,哥特(Goth/Gothic)元素与创作童话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尔德(Oscar Wilde)创作了多部哥特文学经典,哥特元素也流淌进他的童话创作当中;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为创作童话的先驱,其作品中的哥特元素也随处可见。与早先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不同,自19世纪以来的创作童话,唯美的艺术性元素增加,黑暗性减弱,不仅使儿童获得伦理启蒙,也帮助其在阅读中成为积极的审美主体,逐渐摆脱作为训诫对象的被动地位。优秀创作童话通过哥特元素的呈现,在规避训诫意味的同时,并未丢失文学的基本教诲功能(聂珍钊,2014:248)。在优秀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与作品的趣味性、教育性紧密融合,不可分割。对于这一存在事实,重点不在于是否需要将黑暗性从中剔除,而是探讨其存在的深层原因与表现特征:“黑暗”何以呈现“光

收稿日期:2024-06-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研究”(21BWW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一凡,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及其跨学科研究。

徐德荣,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及其跨学科研究。

引用格式:赵一凡,徐德荣.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的教诲机制研究[J].外国语文,2024(6):78-89.

明”？哥特元素究竟有何独特的文学价值使其频频出现在优秀创作童话中，乃至成就了部分作品的经典性？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创作童话与哥特文学的亲缘，阐述其在创作者、故事主题、创作手法等方面的联系，归纳创作童话哥特元素的道德教诲功能，并以王尔德、安徒生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为例，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深入探索道德教诲功能的实现机制，总结出其以哥特式情感反应为基础的情感机制，以哥特式叙事呈现为手段的叙事机制，认为其道德教诲的实现基础在于儿童共情(sympathy)与移情(empathy)的情感反应，具体手段则是通过以伦理悖论形式出现的哥特式非黑即白的叙事呈现，通过伦理选择解决伦理悖论，刻画人物角色的行动，生成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道德教诲功能。

## 1 哥特元素：亲近儿童与道德教诲

广义上讲，“哥特”一词最早指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一带的哥特人(格温,2020:4)，随着其部族文化的弥散与发展，哥特人虽已消失，但“哥特”渐渐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其常以恐怖、超自然、死亡、孤独、巫术等内容为主题，常含古堡、鲜血、十字架、教堂、墓园、黑夜、蝙蝠、吸血鬼、乌鸦、黑猫等标志，被广泛运用在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领域。就文学领域而言，含有上述标志性符号、着重渲染恐怖氛围、情节发生地设在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城堡的故事，便被称为哥特小说(Gothic fiction)。尽管常带有黑暗、阴森等标签，哥特文学却与儿童文学有着微妙的联系，不仅其创作者曾存在高度重叠，二者在故事主题、创作手法上也有着相似之处；其主人公在社会系统中的边缘性，也成为二者共有的创作根基。可以说，哥特元素是亲近儿童的，其独特的风格为儿童阅读增添了不少趣味。也正是在此影响下，创作童话的道德教诲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同时更易于儿童接受。

首先，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儿童文学的复兴几乎与哥特文学的创作热潮同步发生，许多儿童文学作者也是哥特文学、艺术的积极推动者。例如，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作为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运动中的艺术流派，其发展离不开彼时的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赞助与支持，其本人在支持哥特复兴运动中所创作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1841)“被视为英国创作童话的先驱性作品”(朱自强,2009:213)；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的创作长诗《精灵广场》(*Goblin Market*, 1862)，初版时为此童诗配画的正是其兄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拉斐尔前派重要代表画家；经典哥特小说《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1886)的作者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也创作了《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1883)等优秀儿童小说，并出版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1885)；王尔德作为小说家创作了包括《道林·格雷的画

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 等在内的多部哥特文学经典,其唯美色彩强烈的童话也体现着哥特元素的精妙运用;安徒生童话的英译在 19 世纪初版并获得广泛回响,读者于其中也可窥见诸多哥特元素,如颇具崇高性的死亡,神秘化的割舌、断脚等身体分离情节。

其次,哥特文学与儿童文学故事主题的相投、创作手法的互借,成就了创作童话与哥特元素的契合。在整个 19 世纪,现代理性怀疑精神与超自然力量相互碰撞的哥特式“鬼故事”(ghost story)是十分流行的创作题材,而这一碰撞也常常作为儿童认知成长中的困惑出现;此类哥特文学的典型创作手法之一便是转述,即通过一人之口讲述另一人的故事,这一叙事方式也常见于童话创作。哥特元素迎合了儿童心理发展的探索欲,本就易引发儿童好奇,吸引儿童阅读,而经人代述的叙事手法进一步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增添了神秘感,使得文本更具魅力;同时,其模糊性、神秘性也强化了理性与感性、逻辑与直觉的分立,使得故事更具张力。在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短篇小说《W. H 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Mr. W. H.*, 1889)、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以及玛丽·雪莱(Mary Shell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中都可寻得这种“story in story”的叙事模式。“讲故事”的创作手法,与儿童文学尤其是民间童话、寓言的传播方式不谋而合。含有哥特元素的创作童话也部分沿袭了这一哥特文学的叙事手法,例如王尔德《忠实的朋友》(*The Devoted Friend*, 1888)便是通过一只朱顶雀的转述展开的。对于处在理性启蒙阶段的儿童读者来说,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论乃至悖论充满了挑战与乐趣,无怪乎哥特文学中的主题与叙事手段也多出现在创作童话中。

儿童文学,尤其是创作童话,有诸多与哥特文学重叠、共享的元素及特征,原因或许在于创作者对于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两种文学体裁主人公在社会中的边缘性成为其共有的存在性创作根基。哥特文学常以怪人、畸人、少数群体成员等边缘人为主人公,饱含对于人性、理性的幽思;创作童话的主人公往往是儿童读者投入情感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儿童。无论是满腹忧愁的王子、独守寒冬的燕子还是饱尝辛酸的美人鱼,均隐喻了初具主体意识的儿童的某一人格侧面。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家庭成员的弱势一方,即便生活在和美的环境中也总难免在某个时刻面临由其自身感受的或轻或重的被控制、被训诫、被打压、被忽视的处境,而创作童话中偏离主流的主人公,恰似哥特文学中的边缘人物给予成人读者反思、慰藉一样,给予了儿童读者被看见、被关照的安心感。此外,正如哥特建筑的繁复、崇高的美学特征,哥特文学中的主人公性格也颇为复杂,往往徘徊于神圣与邪恶之间,在爱恨生死的困境中挣扎;这种情节设定反映在创作童话的哥特元素中,体现为主人公所要面对的残酷、黑暗的伦理悖论,映照出儿童读者在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伦理成长与伦理选择。

创作童话与哥特文学亲缘深厚,创作者高度重合、联系密切,二者重点着墨的主题与人

物也存在相似的处境,这些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许多优秀创作童话中都含有哥特元素,然而却不能回答“为何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能够源远流长、一直深受儿童读者喜爱”这一问题。还有什么支撑着其持久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诲功能,而其教诲功能的实现便是哥特这一略显黑色的元素能在儿童心底播撒光明的原因。

## 2 哥特式情感反应:实现教诲的情感机制

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道德教诲功能的实现基础便是儿童在哥特式情绪线索引领下产生的情感反应,其中以阅读中的共情与移情最为典型。

### 2.1 哥特式情绪线索:“诡异”(uncanny)与“惊奇”(curious)

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含有恐怖、血腥、暴力等哥特式语义成分的叙事元素。其主要呈现方式可以透过两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为“诡异”,二为“惊奇”。这两个关键词作为哥特式情绪线索,侧重不同、各有所指,“诡异”指物件的表现特征,反映主体对原始兽性(伦理秩序、道德观念建立前的)不确定性的恐惧;“惊奇”则关涉人物的心理反应,反映主体对良善人性、伦理秩序的内在追求。

“诡异”一词首先出现在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1906年发表的《论“诡异”的心理学状态》(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一文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19年的文章《论“诡异”》(The Uncanny)从精神分析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恐怖情绪的基本发生机制,并使得“uncanny”一词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955:219)在原文中使用的是德语词“unheimlich”,有神秘和恐怖两层含义,英文中直译为“unhomely”。英译中普遍使用的“uncanny”一词,本身即带有含义模糊的性质。弗洛伊德在考察、分析词源的基础上,用“uncanny”指代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或情景,如鬼魂、僵尸等非正常的人类——他们一方面具备我们所熟悉的人类躯体,另一方面又有着与正常人类截然不同的眼神、姿态等,这种“既熟悉又陌生”感升起后,失序感、失控感随之而来,恐惧由此产生。“uncanny”事物的(分类)模糊性,迎合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儿童在伦理启蒙期不确定的心理状态。而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也指向了自己所未知事物的崇高性(sublimity)。诡异效果的实现,通常是个人化及情境化的。个人化条件包括个人化的身份、名字、经历等;而情境化则与语境有关,如发生地点、熟悉程度等。诸如“一面镜子开口说话”“一幅画上的人动了起来”等设定往往迎合儿童的想象,但同时,儿童的理智也告诉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从未也不会真的“活过来”,因此,这种想象及现实层面双重的既熟悉又不熟悉感,便生成一层诡异的气氛。

如果说“诡异”更多侧重于外部环境、外部物件而营造的情绪氛围,“惊奇”则更多是用

于形容人物的内在心理反应,通常在直接、间接引语中得以体现。“惊奇”的英文为“curious”,这一词汇同时也包含了中文的“好奇”之意,在哥特式创作童话中,这不仅折射出儿童对于成人社会以及成“人”的好奇与向往,也体现为因“诡异”的外部环境而产生“好奇”,在进一步探索中越发体验到“奇异”“惊奇”的感受。例如,在英文版《海的女儿》(*The Little Mermaid*, 1837)中,开篇即形容小美人鱼为“curious child”(Anderson, 2003: 2),而最令这个“curious child”心向往之的便是人类世界(Anderson, 2003: 2);在幻想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865)中,爱丽丝在经历一系列荒诞不经、颇具上述诡异效果的场景时,最常产生的情绪反应便是“惊奇”。儿童在现实生活中要面对诸多未知的不安、焦虑,如第一次上学、离家、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睡觉、独行时与一只大狗狭路相逢等,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能够还原这些生活中的恐惧,以其自身独特的教育性,鼓励儿童勇敢成长与探索。

哥特元素在创作童话中,借由外部环境的诡异、人物内心的惊奇,折射出儿童被放置在故事外的现实世界的处境,回应了其尝试走出伦理混沌的内心不确定感。自儿童从母亲的子宫被挤压而出,现实环境对于儿童而言无疑是诡异的,一切似乎都曾经在母体中听闻,但一切又显得很陌生:没有了脐带,摄取养分不再轻松、直接,而是需要通过手部的摸索、传递和唇舌的蠕动,进食这一项原本熟悉的活动变得“诡异”起来,而自己最为熟悉的母亲也正是一直靠这一“诡异”的进食方式为自己提供养分,这更增加了儿童对于现实世界“熟悉而又陌生”的复杂感受。儿童适应现实世界的其他活动也与之类似,认知世界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过程,一定程度上的确定性衍生出了更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儿童从诸事惊奇转换到习以为常的过程,正是其逐步“脱敏”、适应现实世界的过程。创作童话在叙事中,哥特元素忠实地再现了儿童的“脱敏”过程,其教诲功能体现在通过回应儿童内心的不确定性,帮助儿童逐步确立自身与社会的伦理关系,认识现实社会所鼓励的伦理秩序,同时找到自己的伦理秩序中的相对位置。创作童话的主要目标读者多为刚走出幼儿期的儿童,其社会化欲望日益萌发。他们开始接受教育,在家庭、学校、社会的三重道德教化之下,普遍存在对于自己“犯错”“变坏”的焦虑与恐惧。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能够将其内在的这种焦虑、恐惧具象化为一个个尚待解决的“诡异”事件,在“惊奇”中,当这些“诡异”在内心被归化为平静,儿童便获得了既符合内心秩序又符合外界道德要求的心灵自由。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通过诡异的情景设置,制造惊奇的内心体验,目标儿童读者沿着这一情绪线索,产生共情与移情等情感反应,从而收获模拟现实的伦理体验。

## 2.2 儿童的情感反应:共情与移情

在儿童的阅读过程中,共情与移情的情感发生帮助儿童最终达成了内心一定程度的伦理稳定。共情是指设身处地体验、感受他人的处境与情感。就此而言,一方面,儿童能够将

自己代入主人公身上;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将自己带入邪恶的反派身上,后一种情况体现为:“故事中主角与邪恶的女巫对抗,让儿童把自己内心不好的倾向投射到女巫身上,迫使儿童直接面对这些特质。因此遭遇女巫就变成自我认识的行动,让儿童了解平时可能会否认或忽视的部分自我。”(卡什丹,2014:37)创作童话里的坏人总是少数,坏的想法总是短暂,而把少数的坏人与自己区隔,把暂时的坏想法消灭,才能使儿童获得一味维持内心平和的稳定剂。“唯有女巫死掉,儿童才能克服困扰他们的想法与不对的冲动。”(卡什丹,2014:37)“女巫的死亡象征美德战胜邪恶,象征自我中正面的力量取得上风。”(卡什丹,2014:38)而前者则更容易理解,那便是通过与正义的主人公共情,体悟“道德榜样”所带来的启示。聂珍钊(2014:248)认为,文学作品教诲功能的实现,主要便是通过“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的道德榜样。

哥特元素在创作童话中,借由外部环境的诡异、人物内心的惊奇,折射出故事外的现实儿童被放置在现实世界的处境,便有了儿童移情的基本前提。与共情不同,移情是将自身的经历、感受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情绪反应。在阅读中体现在儿童读者以自身的情况去理解、解读角色的行为,虽然或许与作者的本意、角色的本意不同,但儿童将自身的情绪及疏解方式投射到人物身上(例如认为人物是出于对于母亲管束自己的愤怒而行事),这之中的暴力性便是一种替代性释放。我们可借助儿童心理学家罗尼·索兰(Ronnie Solan)对于儿童健康自恋的比喻来理解移情的作用。索兰(2019)认为,儿童的健康自恋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情绪免疫系统”的作用,“保护着我们[儿童]自体的熟悉感、抵制任何挑战这种熟悉感的陌生或差异性”,借助这个系统,“通过自我适应的功能运作来改进和实现我们[儿童]的智力潜能(精神运动、认知和情感)、应对现实”。其理论可以理解成免疫细胞吞噬入侵细菌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自体的自恋信息想象成一个球形的网状结构,网络中的每个交叉点看成自恋免疫记忆,“免疫性记忆是一种情绪工具,它帮助我们适应现实”,遇到新体验时,自体的情绪免疫系统便开始内化过程,通过“吞噬”新体验,将新体验内化成自体内的信息网络的一部分,也就是重新实现了自体感。与此同时,自体的自恋信息网络也变得更大更丰富。移情同样是依据相似的程序运作:“模式匹配”后,便是“情绪练习”,共同的信息提供了熟悉感,在熟悉感的基础上,遭遇可以消化掉的新信息时,“吞噬”即移情就发生了。移情可以理解为,儿童看到新信息与其相似的部分,产生情绪投射,同时将其纳入自体的经验、感受,这种“吞噬”与共情有着不同的机理。

阅读中的“移情”类似接种疫苗的过程,是一种情感的模拟。当生活中真的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因为曾经“打过疫苗”,体内有了抗体,对于某种刺激的情绪反应在先前的“移情”中已经练习过,因此这种陌生感就不会对儿童读者造成破坏性的攻击,他们便可以相对从容地将这种陌生感消化成自体的熟悉感(就如同在情感练习——移情中模拟的那样)。

阅读中,移情的过程也是锻炼情绪肌肉、增强情绪能力的过程。阅读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时,儿童知晓自己阅读的虚构故事,但虚构中又有部分现实(如人物、场景等),这种半熟悉、半虚构的体验,一方面让小读者感受到熟悉感、掌控感、自体感;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因哥特元素产生不安感、陌生感、紧张感,这是绝佳的练习情绪免疫的途径。情绪免疫后,儿童将陌生感内化成熟悉感、自体感,使得内心世界更加拓展、丰富,更加适应现实复杂世界,在面对真实的伦理困境时,便能更加从容地做出判断与决定,也即实现教诲功能的生成。

在这一过程中,创作童话所提供的教诲功能正是帮助儿童形成作为社会有机组成之一的“人”的身份确认。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人的深层伦理构造划分为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兽性因子即人的动物本能(聂珍钊,2014:275),“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兽性残留”(聂珍钊,2014:275),而人性因子即“人的伦理意识,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聂珍钊,2014:274),善恶选择便是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内在博弈的结果。在伦理启蒙完成之前,儿童还在伦理混沌时期,虽涉世不深,但已在诸多碰撞中明白,自己的部分冲动、部分行为是不为社会伦理所接纳、认可的,如何融入现实伦理世界是其成长中的一大课题。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在其中发挥的巧妙作用,便是通过诡异的人、事、物、环境设定,投射出儿童对于兽性因子之破坏性的恐惧,在伦理混沌中确立伦理秩序,树立、稳固人性因子的优势地位。小美人鱼在面对海底女巫(sea witch)时,其骇人的外表及周遭骨头、蟾蜍、蛇等阴森恐怖事物遍地的环境象征着兽性因子的攻击性与混乱性,而身处其中的小美人鱼却在求助变成人的方法,隐喻着从兽身脱胎为人的伦理选择路径。

就文本而言,完成这一脱胎换骨也有其独特的叙事手段。下文将就哥特式的叙事呈现探讨实现道德教诲的叙事机制。

### 3 哥特式叙事呈现:实现教诲的叙事机制

哥特式的叙事呈现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非黑即白的伦理选择,用以处理内在的伦理矛盾;一类是经过反思之后的理性情感,用以解决内外伦理平衡问题。

#### 3.1 设置伦理悖论:非此即彼的善恶选择

哥特式创作童话中,兽性因子、人性因子的伦理博弈过程,体现为非黑即白的叙事呈现。不仅故事中的人物需要面对你死我活的伦理悖论,做出非此即彼的伦理选择,叙述中的人物设定本身,往往也包含着非善即恶的身份、立场。“一个童话故事要成功,要能达成它的心理任务,女巫就非死不可,因为女巫就是自我邪恶部分的化身。”(卡什丹,2014:32)“在孩子能够用语言表示好坏之前,就已经靠着原始的感觉认识这个世界——将外面的一切都分成好与坏的两面。”(卡什丹,2014:28)例如饥饿是坏的,饱足是好的;被拥抱是好

的,被无视是坏的……儿童内心深处的对立矛盾,来自其对于脱离子宫后现实世界的不安和焦虑;妈妈并不总是在,现实有时满足他,有时无法满足他,他无法理解(因为原先在子宫里需求是被无条件满足的,也无需费力)。妈妈分裂成好妈妈、坏妈妈,这种好坏分立是儿童认识世界、确立内心秩序、获取些许确定性的方式。创作童话中非黑即白的哥特式叙事呈现恰如其分地表征了其心路历程。

这一较为极端的哥特式叙事呈现,在情节中往往体现为戏剧性的伦理悖论。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最初伦理悖论被定义为“在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聂珍钊,2014:254),由伦理矛盾引起。徐德荣、杨硕(2017:61)依据个体的不同伦理身份,进一步将伦理悖论划分为家庭伦理悖论和社会伦理悖论。这两种悖论都体现了个体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所需面对的伦理困境。在此之外,尚存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伦理悖论,那便是发生在个体内部的自我伦理悖论,例如获得短期满足与长期满足之间的矛盾:当下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都有权利获得满足,然而哪个更有获得满足的优先级?再如快乐生活与高尚生活之间的矛盾,二者都是儿童想要的,当不可兼得时,择一的过程往往充满挣扎与成长的艰辛。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为其主人公制造了诸多类似的伦理悖论,关涉他人,也关涉自身。其功能一方面帮助儿童理解并融入默认为善的社会伦理的结构,一方面启蒙儿童踏上实现自我一致性的探索。

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方面,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式伦理悖论集中体现为满足个人需求与成全他人需求的矛盾,即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这二者之所以成为悖论在于,带有哥特元素的创作童话往往设置了非此即彼的零和冲突,即满足个人需求必将剥夺他人需求,而成全他人需求则必须以牺牲个人需求为代价。如此设定,削弱了现实世界伦理秩序的复杂性,通过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可启蒙儿童在伦理选择中初步分辨善恶之别,确立基本的伦理道德秩序。同时,又因儿童在此特殊的伦理启蒙阶段,需要通过人性因子完全战胜兽性因子来消除其对于加入成人世界伦理秩序的疑虑,使其初萌的伦理意识变得清晰,通过确定性消除模糊性,给予儿童尝试融入现实伦理世界的安全感。

在王尔德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中,这种伦理悖论随处可见,甚至是故事的叙事主线,其中诡异而令人惊奇的哥特元素使得悖论中的矛盾更为尖锐,善恶不可调和性是此类创作童话的典型特征。而构成伦理悖论各个部分的关键人物,通常具有善恶分明的角色设定,主人公往往代表纯粹的善的一方,而反派往往代表纯粹的恶的一方。同时,沿袭创造真实幸福的辩证逻辑,启蒙儿童发展理性情感。“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核心和外在表现。”(聂珍钊,2014:253)在王尔德的《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1888)中,快乐王子为了帮助穷苦的人,必须割舍掉自己所佩戴的宝石、金片甚至眼睛,他是全然的人性因子的化身,当保全自己生命的责任与拯救他人的恻隐之心相悖时,他选择了一种伴随严酷身体伤害的哥特式

的崇高性自我牺牲。安徒生《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必须在追求自身幸福与成全他人幸福之中择一,前者需要杀掉王子,而后者需要杀掉自己,一个行为指向全恶,一个行为指向全善,丝毫没有折衷的余地。最终,在王子成婚前夜,她选择扔掉巫婆的刀子,走向大海化身泡沫,化身为纯粹的善的代表。聂珍钊(2014:49)曾对小美人鱼的成“人”之路作出评价:“小美人鱼的遭遇表明,无论是人还是兽,在追求做人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而王子对于小美人鱼的全部经历与最终选择毫不知情,不仅表明小美人鱼在故事中是一个“uncanny”的存在(王子对于半人半鱼且丧失话语能力的她始终似识非识、似懂非懂),也增加了她牺牲的崇高性(未被看见的牺牲成为了纯粹的奉献与灵魂的服务),在这种极具哥特式戏剧化的张力下,善与恶的分野大大凸显,也增添了文学教海的感染力。结尾那句“善行成就不灭的灵魂”(Andersen,2003:23)也便水到渠成。无独有偶,在王尔德笔下另一个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忠实的朋友》中,善良忠厚的汉斯作为人性因子的代表也是在又一次无私的奉献中意外殒命。故事中,汉斯与反面人物米勒分别处在利他与利己的极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可视作儿童的利他本能与利己本能的暗喻,象征着儿童内心并存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意外的是,利他本能的代表惨死沼泽,利己本能的代表依然招摇过市。这一哥特式的结局难道寓意着一场利己主义的胜利吗?并非如此。对于自私自利、不思悔改的米勒,王尔德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悟其中含义并尝试反思心中的利己本能。而米勒最终仍活得很好,实际上正说明了革除兽性的艰难与痛苦——这些人选择了更容易的一种解决伦理悖论的方式,那便是放弃挣扎、任由兽性因子蚕食人性,彻底成为满足原始兽性因子的奴隶。

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说:“自由并非一种哲学,甚至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场觉醒的运动,有时它会引导我们发出两个单独的音节:‘是’或‘不’。”(帕斯,2006:511)创作童话中通过哥特式的“是、否”抉择,让儿童初步确立道德选择中的善、恶分立;同时,也通过对恶的呈现,在善恶博弈中自主地抛弃兽性冲动,自由地选择理性情感,初步建立内在伦理秩序。

### 3.2 暗喻理性情感:利他利己的伦理平衡

儿童有着亲近他人、亲近社会的本能,渴望成“人”,是儿童的天然愿望。变成“人”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让周围的“人”也确认自己是“人”的过程。社会伦理是理性“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除了解决个人与他人的需求矛盾、完成社会化的任务,儿童在伦理成长过程中,还有更长久而艰巨的自我一致性的达成,需要他们直面并妥善处理自己内在的伦理悖论。

在哥特式的创作童话中,主人公通常经历过自由选择而终成为“人”。儿童将懂得不是他们的想法决定了他们是谁,而是他们最终经过理性思考的行为选择,决定了他们是否

为“人”。如此,便更深一层抚平了其对于内在频繁闪现的兽性冲动的焦虑。这一从兽性本能到人性理性的道德发展过程,蕴含着一条隐秘的辩证逻辑,即由生存理性到道德非理性而最终达成理想的情感理性。生存理性即为争取生存条件、生存利益的本能生存意志,道德的非理性即是在这一逻辑之上的“非理性”行为,如自我牺牲、损己利他行为等,而实际上,只有通过自主选择这一貌似非理性的道德选择,理性情感才能最终得以实现。“理性情感即为道德情感”“道德情感即受到道德约束的情感。”(聂珍钊,2014:249)有相反观点认为,人天生具备道德感(布鲁姆,2015:25),然而这种“道德感”更多指向一种朴素的、直觉式的道德判断(其本质也是源自人类为了种族延续而发展的有条件利他的“自私”的基因),而非关涉自身利益的理性道德选择。在不加干涉的情况下,这种朴素的天然道德感,甚至会诉诸暴力,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可以说,道德是一门需要学习的知识,而非天生具备。发展甘愿选择利他与自我牺牲的理性情感,是创作童话叙事中成为“人”的必要前提。简而言之,人物首先要通过克服本能的生存理性,在道德上自愿地作出“非理性”行为,才能实现情感理性。而这一过程中,主体正是因为被赋予了可以“不道德”的权利,主体在不限定的选择的自由中,通过自由选择“非理性”的道德责任,最终成为“人”。成为人,便是自愿献祭自己心中野兽的过程。通过这一自愿的献祭仪式,主体之为“人”得以确认。在《快乐王子》的故事中,假如王子没有牺牲自己拯救他人,那么日日夜夜立在城市之上目睹世间惨象的他,想必也不会快乐;而《海的女儿》中,假如小美人鱼选择了杀掉王子,回到海底的她一定也不会幸福。他们作出的伦理选择,都是自愿为之,甘于自己选择的后果,敢于面对自己的伦理责任。

理性情感,是人达成真实幸福的必要条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贯彻利他与牺牲精神。从“道德”的英文词源“moral”来看,其源自拉丁语“mores”,意为“习惯、惯例”,这一渊源提示我们,有些所谓“道德”的,可能只是人们长期遵循的“习惯”,并非是真正“好”的、“善”的,这些例外留给我们自由选择的余地。达到成“人”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可能有多种,试图在不同情景中套用某个自认为万能的道德公式,非但无法成人,反倒成为深陷规则泥沼的困兽。因此,要警惕的便是“权威形成成规”“成规形成权威”(张嘉骅,2016:215)的情形乃至循环。儿童的伦理成长是其自愿去除兽性、发展人性的过程,最终使命便是有机地融入社会相互关系。这其中既包含了整合内在自我的一致性,也包含了嵌入外部社会的自主性。通过自由选择理性情感,儿童才是自身选择的主体。否则,仅作为他人意志的实现工具、社会惯例的奴隶,无需任何反思,儿童难以获得伦理上的认知成长。成人对儿童的道德教诲,自由是必需的前提,儿童有权利说不。在《忠实的朋友》中,人性因子大获全胜的主人公汉斯,虽然所作所为符合自己对于“忠实朋友”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忠实于自己,为了尽作为朋友的义务,全然不顾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业与生活,其横死的结局也暗

示了其内在伦理的失衡。

同时,创作童话的哥特元素蕴含着拒绝主流霸权的反抗性。正如哥特文学的主人公往往是边缘性的存在,创作童话的主要人物及目标读者也远非社会强势群体,其内在往往压抑着愤怒与不满,而其反抗性一方面体现在哥特元素所呈现的诸多“诡异”与“惊奇”之中,另一方面体现为人物甘愿承担自由选择之后的结果。无论是快乐王子,还是小美人鱼,他们在践行自身的道德原则时,也在身体力行地拒绝社会主流所喋喋不休的一个个规训。儿童读者深深了解作为弱者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那部分压抑,因而乐于看见小主人公的反抗,从而在阅读中满足自身反抗的想象。借由哥特元素的反抗性,儿童找到了疏解、释放兽性因子的替代出口,进一步维持了内心伦理秩序的平衡。

创作童话中的哥特元素带给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诲,通过残酷、极端的情节设定,让儿童明辨是非,坚守正义,同时自主地思考自身所处的伦理网络中的伦理责任,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既融入伦理社会,又确立有道德的自我,这便是其教诲功能的实现。

#### 4 结语

为回答“黑暗”何以呈现“光明”、照亮儿童的伦理成长之路的问题,本文从情感与叙述两方面探索了创作童话中哥特元素道德教诲功能的实现机制。情感机制中,“诡异”的哥特式语境、“惊奇”的哥特式心境或可以其文学张力生成各年龄读者与文本的情感互动;而叙事机制中所总结的哥特式“非黑即白”的叙事呈现,则更多指向初步建立是非善恶观的儿童,以帮助其走出伦理混沌。在目标读者年龄更高的幻想小说中,哥特元素往往有着更为复杂多元的伦理呈现与叙事呈现。

此外,本文着重围绕19世纪创作童话的哥特元素展开论述,多以王尔德、安徒生的作品为例,而仍有诸多饱含解放性的当代创作童话及童话改编值得研究探索,如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对于经典民间童话《蓝胡子》(Bluebeard)的改编(Carter, 1979: 7-41),描绘了强权之下女性的迷惘、成长与反抗,充满了女性主义观照,具备哥特叙事独有的激进性,值得继续探索。

#### 参考文献: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2003. *The Little Mermaid and Other Fairy Tales*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Carter, Angela. 1979.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Freud, Sigmund. 195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 (1917-1919):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and Anne Freud, 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The 'Uncann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Jentsch, Ernst. 1997.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 (1906) [J]. *Angelaki* (2:1): 7-16.

- Wilde, Oscar. 2008.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 [M]. Auckland: The Floating Press.
- 布鲁姆·保罗. 2015. 善恶之源 [M]. 青涂,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卡什丹·谢尔登. 2014. 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 [M]. 李淑珺,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格温·戴维. 2020.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 [M]. 曹磊,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帕斯·奥克塔维奥. 2006. 帕斯选集(上卷)[M]. 赵振江,等编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 索兰·罗尼. 2019. 童年之谜:了解儿童内心世界的心理学指南 [M]. 丁瑞佳,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 徐德荣,杨硕. 2017. 罗尔达·达尔儿童幻想小说的伦理悖论研究 [J]. 外国文学研究(1):60-69.
- 张嘉骅. 2016. 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 [M].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 朱自强. 2009. 儿童文学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The Moral Educating Mechanism of Gothic Elements in Literary Fairy Tales

ZHAO Yifan XU Dero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troversial existence of Gothic elements in literary fairy ta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y are endowed with irreplaceabl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which allows Gothic elements to bring light to young readers' hearts. With regard to its educating mechanism, the paper explores its emotional mechanism and narrativ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and taking Wilde's and Andersen's fairy tales as examples. We believe that the emotional response based on Gothic emotional clues, and the "all black or all white" Gothic narrative help children—in the "uncanny" Gothic context and the "curious" Gothic mood sympathizing and empathizing with the characters—familiarize with the ethical choices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erefore not only establish their ethical identity as "human", but also gradually develop rational emotions, so as to form healthy social ethics and ethics of self, achieving ethical balance.

**Key words:** literary fairy tales; Gothic;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moral education; educating mechanism

责任编辑:冯革